

系列專文第七篇 赤色文棍姚文元

一向為「上海幫」中的「文化打手」姚文元，在此次「華江大門」中，已隨其丈母娘江青一同被整。他與王洪文同為江青快婿，文革以前，均無藉藉之名。文革一起，姚某憑其一枝尖利凌厲的筆桿，橫掃三十年代左翼文化人，替毛酋立下「汗馬功勞」。直到其被捕前，尚經常代表匪黨發表一些「決策性」的文章。故欲瞭解中共竊據大陸後文藝政策的演變，以及近年來其內部動亂的真相，姚某其人其事是值得注意的。

本文主要將介紹姚匪早年出身，及其投入匪黨後，充當「文棍」的經過，最後再談談其被整的原因。

姚文元，浙江諸暨人，生於一九二五年左右，現已年過半百。其父姚蓬子，係三十年代混跡上海的左翼名作家，與魯迅、丁玲、老舍等人均甚友好。姚匪從小即在此一左傾氣氛甚濃的環境中長大。

姚匪幼時曾就讀於上海工部局小學（在英租界內，由英人所辦之公立小學），初中畢業於光復中學。抗戰期間，姚匪隨家人遷重慶唸高中，戰後進復旦大學。一九四九年大學畢業後，即任匪偽「上海市人委會」外事組副組長。不久調充匪「解放日報」助理編輯。

一九五一年，姚匪進入匪「新民主主義青年團」上海工委會工作，並兼匪「文藝報」（半月刊）通訊員，開始其赤色文藝生涯。先後發表「一箇值得嚴重注意的數字」、「應改進歌曲出版工作」、「分清是非，劃清界線」等文。開始攻訐批判一些三十年代知名作家，由於文筆銳厲，殺氣騰騰，一時名噪上海，與當時批判俞平伯「紅樓夢研究」而竄紅的李希凡並稱「南姚北李」。

一九五七年，毛匪發動「反右鬥爭」。當時在滬主持文藝工作的張春橋，即利用姚匪充作文化打手，在上海也展開了文藝界殘酷的「反右」鬥爭。此時，姚匪以「文藝月報」為陣地，連續發表「新山海經——談階級仇視與階級鬥爭」、「駁施蛸存的謬論」等文，對施蛸存、丁玲、馮雪峰、巴金等「右派份子」展開一連串的攻擊批判。

一九五八年四月，姚匪任匪偽「青年聯合會第三屆全國委員會」委員，一九六〇年二月，當選偽「作家協會」上海分會理事。

此時，負責匪黨文化思想戰線的頭目彭真、陸定一、周揚等人，正竭力抵制對所謂「資產階級文藝思想」的批判工作，故對這位終日以鬥爭「右派」作家為能事的姚匪，甚表不滿。一九六二年春，匪黨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在一次文藝工作會議上，指責姚某的評論文章太過「單相」、「粗野」和「可怕」，並要參加會議的上海文藝工作者，對姚匪進行批判；同時，匪黨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楊西光、「文聯」上海分會主席席巴金等亦公開施加壓力，迫使姚匪一時不敢再任意發表攻擊性文章。

一九六五年十月，「文革」前夕，江青專程赴滬和張春橋密商，準備發動「文革」。姚匪得張匪推荐，在毛江的授意和支持下，於十一月十日，在上海「文匯報」發表「評新編歷史劇『海瑞罷官』」一文，開響「文革」第一槍。

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，姚匪在「人民日報」又發表「評陶鑄的兩本書」（按指「理想、情操、精神生活」和「思想、感情、文采」二書），正式點名批判陶鑄，並批判「極左思潮」和「五一六兵團」。一九六八年八月，姚匪在「紅旗」雜誌發表「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」的文章，直接傳達了毛酋「指示」，命令「紅衛兵」和知識份子必須接受工人領導和貧下中農的「再教育」。

姚匪這三篇「政策性」的文章，替毛酋奠定了「文化大革命」的理論基礎，可算「厥功甚偉」！

一九六九年四月，匪黨「九大」召開，姚匪當選「政治局委員」，正式進入匪黨「領導核心」，負責匪黨意識形態的鬥爭工作。

一九七三年「十大」時連任。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，與江青、王洪文、張春橋等人一同被捕。華國鋒迄今仍在整肅其「文化戰線」上的餘黨。

姚文元，自其投匪後，即以「文化打手」姿態出現，始而

反「右」、繼而反「修」、終而反「資」，二十八年來橫行赤色文壇，反盡三十年代最優秀的知識份子和文藝工作者，為匪文藝界議為「文藝棍子」！

姚匪原為匪黨文藝界一小卒，後因張春橋刻意栽培提拔，並攀上江青，成為毛酋快婿（姚匪之妻李訥，筆名蕭力，係江青長女，曾任匪「解放軍報」總編輯，江青事件爆發後，被捕），與王洪文同屬「坐直昇機上來」的「新生事物」，但由於其囂張跋扈，路線過左，樹敵太多，故在毛酋倒斃後，與王洪文等人一同摔下這架「直昇機」！

一九七七年五月於華岡

德國薛文德博士 (Martin Schwind) 讚美「美哉中華」

——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致創辦人函——

「美哉中華」第二期刊，內容很豐富，以及許多彩色圖片，不僅可以作為雜誌的模範，而且顯示出將來發展傳統要素的全國性觀念。因此我認爲這雜誌是文化發展和教育的工具。您在前言中所說的目的已經做到，想來您也高興，希望將來繼續有這樣好的成績。

華岡筆談

論韓非的君道思想

史三李銘展

三、君操刑德以制臣

法術爲帝王制臣之工具，不可一日或缺。然只有法術而無勢，仍無法使臣下服服貼貼地甘心受制。功名篇說：

「夫有材而無勢，雖賢不能制不肖。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，下臨千仞之谿，材非長也，位高也。架爲天子，能制天下，非賢也，勢重也。堯爲匹夫，不能正三家，非不效也，位卑也。千鈞得船則浮，鎔銖失船則沉。非千鈞輕而鎔銖重也，有勢之與無勢也。故短之臨高也位，不肖之制賢也以勢。」

又人主篇云：「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，以筋力也。萬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，以其威勢也。威勢者，人主之筋力也。」

人主只要有勢則可行法術並能制馭天下。且天下賢德兼備的人少，因此人君須持術勢方能立於不敗之地，免爲宵

小所承。而人主之威勢其表現於外者，則爲賞罰。賞罰爲君之二柄，亦爲制馭臣下之良方。二柄篇曰：

「明主之所以導致其臣者，二柄而已矣。二柄者，刑德也。何謂刑法？殺戮之謂刑，慶賞之謂德。爲人臣者畏刑罰而利慶賞。故人主自用其刑德，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。」

又五蠹篇云：「今人主處制人之勢，有一國之厚，重賞嚴誅，得操其術，以修明術之所燭，雖有田常、子罕之臣，不敢欺也。奚待於不欺之士。」

凡人莫不畏懼誅罰而利慶賞，故君主利用人此心理，而行其威勢，必能確立其威權。八經篇說：

「凡治天下，必因人情。人情有好惡，故賞罰可用。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，而治道具矣。君執柄以處勢，故令行禁止。柄者，殺生之制也；勢者，勝衆之資也。」

又二柄篇說：「人主將欲禁茲，則審合刑名者，言與事也。爲人臣者陳而言，君以其言授之事，專以其事責其功。功當其事，事當其言，則賞。功不當其

事，事不當其言，則罰。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；非罰小功也，罰功不當名也。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；非不說於大功也，以爲不當名也，害甚於有大功，故罰。」

如此人君握賞罰之柄，操生殺之權，則臣民不敢亂，人人各忠其事，各竭其慮，各盡其智，則天下太平，且君臣皆可交相得利了。

韓非以唯物性惡觀來論列君臣之間的關係，否定人世信義的存在及價值，並且賊害人倫，抹煞人性的尊嚴，難怪司馬遷批評他「慘澹少恩」。而韓非之所以有如此偏激的思想，實因國情與身世之激發（本師王邦雄先生語），使他以爲絕對地尊君可造成極有效率的政府，以挽救韓國漸亡的命運。然而韓非却忽視了一層問題：在追求高度機械效率的政府時，人人爲己，只知趨吉避凶，人情因此日益澆薄。當真正維繫人際的情感覺消失時，舉國上下的同心及向心力也就隨之而蕩然無存了。屆時欲國之亡，可乎！

（續完）